

本书以近代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谭嗣同、章太炎、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为主线，并将他们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揭示了戊戌以来五四思想与精神形成的内在逻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救亡与传统

——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

■ 著者〔日〕近藤邦康

五四与

现代中国

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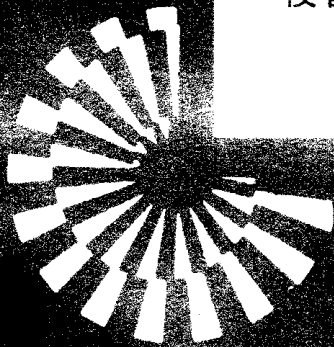
救亡与传统

——五四思想形成
之内在逻辑

著者 /〔日〕近藤邦康

译者 /丁晓强 单冠初 姜英明

校者 /丁晓强



山西人民出版社

415313

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

〔日〕近藤邦康

丁晓强 单冠初 姜庆明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字数：175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 7—203—00875—4

K·38 定价：3.20元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

总 序

发生于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神经。七十年岁月流逝，五四早已时过境迁，但五四所揭示的历史主题——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苦求索的时代主题。时下现代化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反思，骤然缩短了五四与现代中国的时距，而使五四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渐凸显出来。在历史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传统仍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民主和科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启蒙主题。这一切不无悲剧意味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仍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五四孕育了文化巨变的时代，但由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严峻和变革主体思想的局限，终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嬗变。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文化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还须从重新认识五四开始。这种重新认识，既是对五四启蒙事业的

2076/18

继承，又是对五四时代局限的超越。只有在继承和超越五四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实现重建和复兴。因而，在伟大的启蒙时代逝去大半世纪而中国步入变革与复兴历史关头的今天，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

有感于斯，值此“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编就了这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丛书的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凭吊历史，而如其名所示，在于以现代中国的宏阔历史视野重新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省察五四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寻觅中国文化转形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途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对繁荣五四和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而且能对广大关心民族命运和文化前途的读者有所裨益。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1989年1月于北京

译 序

浏览了近年来日文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论著目录，发现近藤先生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开始变了些；在本书前言，近藤先生也提到本书的研究要为以后研究毛泽东思想作个基础。看完近藤先生的这本大作，觉得他是这么做了，我认为这颇有意义。将此书介绍给国人相信会给关心中国近现代历史、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关心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者及其他朋友们以一定的启迪。

今天的文化热，与戊戌以来的文化论争，都带有一种焦虑的情绪，只是过去求强、今天要求富；正因此，在今天的文化反思中观照过去的历史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今天的文化热中，慷慨激昂之辞多了些、扎实冷静的思考少了点，或许思想文化的研究及其发动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吧，在此过程中看看国外学者的冷峻分析，应该说会有益处的。

再则，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们，似乎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传统文化逶迤而来、在今天的精英文化中占主流的文化现象。所谓毛泽东思想，不是一条政治道路所能概括得了的，它是我们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显然，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集中于道路、政策策略方面的研究是肤浅的，间

或也有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分析（如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等），虽然不乏振聋发聩之处，然毕竟只限于议论。在这个意义上，把戊戌到五四的思想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背景来把握，就显然更深入了一步。近藤先生在第三章序的注①中谈到，我们不能用某种“固定”的马克思主义去测定李大钊等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应当通过研究李大钊等的思想进程进而弄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有道理的，近藤先生也是这么做了的。

近藤先生以谭嗣同、章炳麟和李大钊这三个人物的思想作为主线来研究，具有独到的匠心。在戊戌、辛亥和五四中，思想上和政治上最显著的人物不是他们，而应该是康有为、孙中山和陈独秀。但在某种意义上，谭、章、李三人更具有思想史上的联系和中国的传统特点，他们的求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思想嬗递的轨迹。他们的价值标准从修正传统到复归传统再到反传统，他们的目标取向从“近代化”到反“近代化”再到超“近代化”（社会主义），他们对实践主体的认识从乡绅层到下层汉民族再到民众的小组织大联合。近藤先生尤其是用浓墨描写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怎样从天本的立场到民本的立场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明晰地勾勒出了他们的思想进程。其中，许多观点是颇耐人寻味的。他们都十分强调意志的作用，强调个人内心的觉悟，作为原动力，然而又反对“我执”，强调群体的解放；并认为东方“散沙的自由”可以作为近代民主自由之基础等等。其中

有些观点虽不是近藤先生的独创，但就论证的扎实和严密而论，近藤先生是卓越的。

谈到治学的功力，这集中地反映在近藤先生的研究不仅是单线的勾勒，而具有从客观上驾驭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能力。就是说，他不仅仅将笔触停留在谭、章、李的思想进程上，还同时伸向了众多的思想代表人物，如谭与康有为、张之洞的对比，章与孙中山、梁启超的对比，李与陈独秀、毛泽东、袁世凯的对比，其他还涉及到张横渠、王船山、顾炎武、龚自珍、郑观应以及曾国藩、黄兴、杨毓麟、章士钊等众多的思想人物，从而现出了一幅错综复杂而又层次分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画卷。无疑，这本著作的论据充分而又扎实，并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进行宏观上的把握。

近藤先生是日本学者，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和欧美学者有所不同，这在他写的关于勒文森《儒教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的书评中有直截的表示。他反对欧美学者以西方的文明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来衡量东方文明的方式。或许与此有关，作者以赞赏的态度论述了章炳麟反对以西方的“近代化”为目标的思想逻辑。具体的观点姑且不论，我是说，在目前的文化反省中，当我们把更多的目光转向欧美的時候，也了解一下来自东瀛邻邦的观点，是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看问题的。

我把中译本易名为《救亡与传统》（原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这是因为近藤先生是以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中国救亡之路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扬弃作为这本书的基本逻辑来把握的。因此，近藤先生十分推崇寻求到救

亡之路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至此为止，传统文化也取得了新的立足点。这一论证过程无可挑剔，确实较真实地重现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实际状况。然而，作为日本人，近藤先生的研究与今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反省，在情绪感觉上或许稍有不同，中华民族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只是救亡，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如此焦虑。如果把视野再展宽一些，那么，对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情趣大概会稍有不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再探索和发展，也就更有文章可做了。

丁 晓 强

1988年10月20日

前 言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被拽入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灭亡的危机。中国人民经过恶战苦斗，终于从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压迫中挣脱出来，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谭嗣同（1865——1898）、章炳麟（1869——1936）、李大钊（1889——1927）三位思想家是戊戌变法（1898）、辛亥革命（1911）、五四运动（1919）三大救亡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本书试图通过对他们思想的分析来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

本书的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首先要重视中国人对外来侵略与内在压迫这一课题认识的连续性和民众的被唤起与知识分子的领导这一主体形成的连续性，并从中把握救亡的历史；第二，中国的传统思想面临着救亡的课题，通过其在此课题前的奋斗、及奋斗中瓦解的过程而对其加以认识，考察中国人在同旧的思想的彻底决裂中内在地产产生新思想的逻辑和观念上从“天”向人民转换过程；第三，通过对历史与思想的承担者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考察，探究他们在面对救亡的课题并进行奋斗的活动中、变革自身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接近民众的过程。

本书以中国近代史的前半部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试图为考察以后的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展开作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从近代的角度透视中国前近代思想史作准备。

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想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参照。

1981年10月

目 录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清末变法论与谭嗣同思想——变法与圣人之道	
.....	(1)
序 变法与圣人之道.....	(1)
一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	(3)
二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7)
三 谭嗣同的“道器”与“心力”.....	(14)
四 《仁学》的立场.....	(20)
五 《仁学》的政治论.....	(28)
六 学会的性质.....	(34)
结语.....	(39)
补论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	(40)
第二章 章炳麟革命思想之形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	(47)
序.....	(47)
一 变法运动时期.....	(51)
二 从戊戌政变到《苏报》事件.....	(58)

三 《民报》时期	(66)
1 革命道德与众生我	(67)
2 无生主义与民族主义	(78)
3 齐物论与代议制	(90)
中间的总括	(101)
补论一 “近代化”与民族——在中国的条件下	(102)
补论二 革命思想的三大潮流——浙江、湖南、广东	(117)
补论三 答岛田虔次氏的批评	(127)

第三章 《民国》与李达的思想——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序	(137)
一 出发——《言治》(1913)	(146)
二 摸索	(160)
1 留学日本(1913—1916)	(160)
2 归国后(1916—1918)	(181)
三 展开	(194)
1 俄国革命、第一次大战结束(1918—1919)	(194)
2 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19—1921)	(213)
代结语	(235)

书评

勒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知的连续性问题》	(240)
野村浩一著《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筑摩书房, 1964年9月)	(247)
铃江言一著《孙文传》(岩波书店, 1966年10月)	(250)
藤井升三著《孙文的研究》(劲草书房, 1966年4月)	(250)
野泽丰著《孙文与中国革命》(岩波书店, 1966年10月)	(250)
西顺藏著《中国思想论集》(筑摩书房, 1969年5月)	(254)
后记	(260)
译后记	(263)

第一章 清末变法论和谭嗣同思想

——变法与圣人之道

序 变法与圣人之道

1840年英国的大炮，把“相对于文明世界而言是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中国拽入文明世界之中，“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中国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中国人称此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语）。^②为摆脱危机，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领袖的变法维新运动。

变法维新运动直接源于对洋务运动（1860——1894）的批判。汉族大地主在欧洲列强的援助下，用武力镇压了摇撼清朝统治基础的农民大暴动——太平天国运动，嗣后，他们为继续维护旧的统治制度并试图通过吸收欧洲的技术以谋求富强而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洋务运动对于镇压国内的农民暴动虽卓有成效、却无助于抵御外敌的入侵，1894年到1895年日清战争的失败，不能不认为是洋务运动的完全破产。因此，康有为们抨击洋务运动是“皮毛的改革”而要求

进行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变法维新运动就出场了。

变法派的改革方案涉及了政治（设立国会、改革官制）、经济（奖励实业）、文教（废止科举、建立新学堂）、社会习俗（禁止缠足）等诸方面，总括了40年代龚自珍、魏源以来的改良派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基本计划，可以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他们在提出实际改革方案的同时，也进行了改革理论的探索。这方面最成体系的表现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本稿的意图不在于揭示变法运动所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的历史意义，而在于通过他们的思想所表现的世界观，以说明这一运动性质的一个方面。

谭嗣同说：“故嗣同认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报贝元征》）。③

这段话表明：其一，“圣人之道”是反对派和怀疑派攻击变法运动的借口；其二，显然如此，在变法派的观念中，“变法”与“圣人之道”是不矛盾的，甚至只有通过变法才能维持“圣人之道”。那么，变法派对数千年来的旧中国社会的公理——圣人之道——崇尚圣人权威和佩服天子权力的教条加以批判了吗？变法运动是一场以这样的批判为必要条件的根本改革吗？再则，即便如此，这种批判的立场又在怎样的意义上与“圣人之道”相通、与传统思想相通？这种状况是与他们既是改革者又是维护旧中国社会秩序的士大夫的身份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来检讨他们的思想，就能够较清晰地了解由于被卷入近代文明世界而被迫对自身进行尖锐反省的旧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从而，产生了探寻从旧中国中怎样产生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问题的尝试。因此，本稿以变法派

中最激进、思想也最深刻的谭嗣同为研究对象，而为了了解他的问题状况，预先考察洋务派的张之洞和变法派的康有为两位思想家。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大月书店，1954年）第8卷，第4页。（参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8页。——译注）

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第114页。

③《思纬壹壶台短书——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53年。以下简称《全集》）第396页。

一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

张之洞无疑是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因在任湖广总督时建设湖北炼铁厂、湖北织布局（俱建于1890年）而闻名。光绪21年（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建立强学会，他曾给予援助；同年9月，康有为劝说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他亦曾经承诺。一时间，他几乎与变法派同调。可是，他以前就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到光绪24年3月，他写了《劝学篇》，目的是直接反对并批判变法派的思想。研究《劝学篇》，是为了探究反对派怎样看待“圣人之道”与“变法”的关系，便于明确变法派的一些问题状况。

在《劝学篇》的序文中，张之洞谈了其著述意图：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者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痛，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